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坚持『瘦身』和『健身』相结合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

□ 李军鹏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瘦身和健身是人们增强体质、提高各项身体机能的重要方式，两者并不矛盾，经常同步进行。推进机构编制工作也是如此，“瘦身”“健身”都至关重要，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瘦身”就是要从严控制机构和编制的总量，适应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纵深推进的需要，不断精简多余的机构、编制和人员，从而保持科学适度的机构编制规模。“健身”就是要更好发挥机构编制这一重要政治资源与财政资源的效益，加强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机构编制配置，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瘦身”和“健身”都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做到有减有增，切实保障新增职能与服务的机构编制需要。

机构编制工作加强“瘦身”，就要做到“控”和“减”，促进机构编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控”就是要严格控制机构数量、编制总量和人员规模，防止机构臃肿、编制无序扩张。要科学设置机构，从严控制各部门的内设机构、编制和职数；通过编制管理、岗位管理和财务工资管理的改革制岗位的实名化，防止吃空饷现象的发生；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群众团体改革，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程序，使财政供养人员保持在适度规模。“减”就是要按照职能转变的需要，对职能已转移给市场和社会组织的机构编制人员进行核减，按一定比例精简职能已减量的机构人员编制。

机构编制工作加强“健身”，就要做到“调”和“保”，推进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调”就是要将一部分机构编制资源逐步调整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领域、新问题突出的领域和安全发展的领域，以更好地适应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智慧社会发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需要。“保”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地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更好地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背后可能会存在的机构职能履行缺位和编制资源保障不足等问题。例如，为更好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适当增加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机构职能与编制岗位；为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加强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编制保障、充实村医队伍等。把精减下来的事业编制用到民生急需上，更好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23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机构编制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强调机构编制工作“必须坚持把机构改革作为重点，必须坚持‘瘦身’和‘健身’相结合”。

“瘦身”“健身”是人们在运动、健美等方面的日常用语。“瘦身”指的是通过一些方法来降低体内多余的脂肪，“健身”指的是通过科学的运动来强身健体。习近平总书记用“‘瘦身’和‘健身’相结合”比喻机构编制工作要遵循的原则，强调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既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数量和规模，又要提高机构编制管理质量与效率，以更好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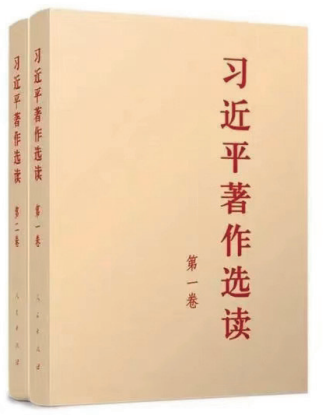
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议事日程

——读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 王 杰 孙庆峰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教是教育的基石，家风反映了家庭的品德和风貌。《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提供了根本遵循。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经过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传统优秀家风已深植中国人的心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随着时代发展，家庭结构和家风家教具体内涵逐渐演变，但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依然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

可替代。”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既是人生启航的地方，又是个人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第一所学校。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精神的港湾，是个体生命、生活、精神所在，是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纽带。同时，小家还连着大家，每个人从小家庭走出，又走进社会这个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家教是家庭中父母长辈对后代子女的教育及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塑造。每个人从牙牙学语起，就不断接受家庭的教育，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对个人的性格、价值观、行为习惯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良好的家教环境中，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不良的家教环境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使孩子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在每个家庭中，父母都应该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则，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是家庭世代袭下来的精神财富，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家庭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家风对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每个家庭都应该注重家风的培养，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才，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领导干部作风不仅体现在工作作风上，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家风也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

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领导干部家风正，才能促进改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家风淳，才能让党风政风清明昂扬。

领导干部的家风，直接关系到干部政德的培养。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如果缺乏良好的家教门风，就算走上了领导岗位，也可能是墙头草，根基不牢，难以为党和国家忠诚干事。同时，家庭是领导干部生活的重要环境，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道德水准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如果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庭式、家族式腐败极易滋生。从近些年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中，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的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个社会的良好民风，是以众多领导干部家庭的良好家风为引领的；一个执政党的良好党风政风，也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家风密切相关。古人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如果家风不正，本人和家人一起贪腐，必然会败坏党风政风社风。所以，良好家风的树立，在现代社会依然是培养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方面。

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努力培育和弘扬良好家风。要善于从红色家风中汲取营养，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深入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文化，让红色家风滋润家庭成员的心田。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大力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家庭成员的道德水平和精神素养。要始终坚持公权公用，以公心办公事，决不能和家庭的私事相混淆，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做到崇德治家、廉洁齐家、勤俭持家。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是一项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全面配合完成的系统

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除了号召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之外，还明确指出要将家庭文明建设摆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充分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的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合力。这不仅是指导思想，也是工作部署，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形成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引导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和能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文化活动，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推广优秀家风家训，引导家庭成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加强社区建设，为家庭建设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重要指导思想。它强调了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应该积极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要用亿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宣传，引导广大家庭注重家风建设，培养家庭成员成为有道德、有文化、有责任感的人。同时，注重家风的传承和弘扬，通过家庭教育的不断优化，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千千万万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将家庭梦与国家梦、民族梦紧密结合起来，让亿万家庭的好家风汇聚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学人小传

赵必振（1873—1956年），湖南常德人，近代翻译家、教育家，译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必求致用” ——翻译家赵必振的治学之道

□ 胡振荣

将国学阐发与经世、救亡、图存结合起来

赵必振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在研习国学的过程中坚持创新变革精神。凭借深厚的国学素养，他撰成了国学专著——《国学概论》。这部著作成书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赵必振反对侵略、以书言志的强烈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他在书中将国学阐发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结合起来，反复强调：“国学之不自，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自知。”他意图通过“国学之昌”，实现一个“为斯民谋幸福，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政治。

赵必振国学思想的创新变革精神，首先源于他对国学本质的透彻认识。他认为的“国学”，就是历代传承的“学术”文化。他在《国学概论·绪言》开篇便称：国学者，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历代祖宗自有文字以来相传之学术也。他将国学的落脚点放在“学术”上面，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赵必振指出，中国传统国学的产生，本是起源于民间，是出于纯粹学



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

术的目的，并且是立足于全体民众的利益。后来，虽然封建统治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各种经典，但他坚定地认为：“圣贤师儒相传之学说，无论其为汉学宋学，真读书人，必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文天祥有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强调了传统国学的研究价值。

赵必振提出的研究国学的目的，也反映了他开阔的学术胸襟。他说：“居而今而谈国学，决非仅如百年以前之学者争道统、争学派而已。今日我国民之所争者，乃对外而争存亡，非对内而争门户之明矣。”对此，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博而约，简而明，举出国学之重要，关系国家盛衰存亡。并以今文学为基础，胪列百家，不持门户党派之见，诋毁他人。”

“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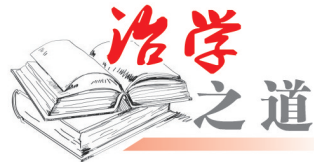
赵必振的教育工作经历十分丰富。早在1904年，他就执教于海南澄迈县，并担任《澄迈县高等小学讲义》的编纂负责人，撰写“修身”“文学”“中国历史”三科讲义。从1928年起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华北大学、北京香山慈幼院高中部、长沙孔道国专修学校、常德私立明义中学等校，负责“历史”“国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赵必振在后半生专事教育，是基于他对教育功能之教导后代、启迪民众、激发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这从他最初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他的译著成果中，关于“教育”专业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如《精神之教育》《万国教育志》《实用卫生自强法》等，无不是反映当时先进教育思想的重要译本。1902年，赵必振在《〈教育丛书〉序》中说：“生存竞争，风潮烈战，何以生存，曰惟教育；何以竞争？曰惟教育。”以开阔的眼界强调“教育救国”的重要性。“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这一清醒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教学实践中，赵必振始终贯彻“学术必求致用”的教育理念，他指出：“学术必求致用，不能致用而谈学

术，则无用之学也。学之何益？”面对当时日寇蹂躏的亡国危机，他经常在课堂教学中，以南宋史事比喻时局，借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期望青年学子“以己为鉴”，关心时局、奋发图强，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在读过《孙子兵法》之后，写下一首七绝诗《题〈孙子〉十三篇后》赠与学生陈旭麓：“相从谈道复谈兵，百感英雄肉内生。胸有阴符谁可授，圉桥独坐待天明。”寄语学生学而致用，效仿秦末英雄张良拯救国家。他用“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孕育了史学家陈旭麓，也滋养了无数国家栋梁。

赵必振翻译思想的民族家国情怀，来源于其坚信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自豪感和心怀天下、谦逊求教的治学精神；他的国学思想的创新变革精神，来源于他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治学风格；他的教育思想的学以致用理念，来源于他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责任感和经世致用、敬业奉献的治学态度。他的治学思想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深入学习、积极传承并发扬光大。



借鉴“他山之石” 启蒙民众

赵必振投身“新学”翻译工作一开始就是本着为民众启蒙、为民族寻路的目的。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译著《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的《自序》中写道：“今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百喙一辞，万声同籁，莫不曰维新维新。叩其维新之道，师法欧美者十之三，师法日本者十之七。”日本“维新”取得的显著成效，启发了赵必振等有志青年。对当时国人之萎靡愚昧、国家之穷困落后，赵必振痛心疾首，一种借鉴“他山之石”奋起直追的强烈愿望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赵必振开启了翻译新学以求救国的为学之路。1901年至1903年，短短两年间，他就翻译了31部、近百万字反映新观念新思潮的日文著作，对国人的

思想觉醒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翻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等作品，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思想之窗；《日本维新慷慨史》《东亚将来大势论》等著作，宣传了维新变革思想，为当时我们的维新变革提供了借鉴；《埃及史》《土耳其史》等作品，总结了其他文明古国亡国的历史教训，希冀国家免于蹈其覆辙；《拿破仑》《世界十二女杰》等英雄人物传记，鼓舞了国民革命志气，宣传了女权思想。这些译著内容广泛，涉及东西方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向民众传播了新知新学新思想。他的译著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具有开拓之功，如当代学者张旭就曾评价：“以译书形式为女子作新传则始于赵必振。”

赵必振在20世纪初就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著作，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近世社会主义》用近2万字的篇幅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赵必振因此被誉为“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